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吴喜梅

(长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从知、行范畴、知行先后、知行关系、致知方法等方面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主要内容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知难行易说的主要贡献和局限。分析认为,知难行易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创新价值,具有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因为受时代限制,知难行易说又具有形而上学性质和绝对化倾向。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孙中山;认识论;知行观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8)03-0107-05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最早明确论述知行对应关系的是《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和《古文尚书·说命中》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一种朴素的知行观,它是以知易行难的形式来表述的,强调行比知难,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行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以此为开端,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诸子,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王充,宋代的张载、程颐、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以及近代的魏源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各派哲学家,从各自的哲学路线出发对知行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和针锋相对的争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知行观。

从中国哲学史上知行观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来看,孙中山之前的知行观有一个鲜明的特点:知行问题尽管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但并没有被当作纯粹的认识论问题来探讨,而往往和伦理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即“求知”和“为圣”是统一的,求知方法往往就是道德修养的方法,行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行为或应事接物的活动。受时代限制,知行学说往往囿于个人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行为,很难摆脱宗教和道德论的纠缠,更谈不上赋予近代民主和科学的崭

新内容^[1]。

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从时代要求出发,独树一帜,提出了知难行易说。表面看来,它不过是传统旧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反对命题,是对知行难易之序的简单颠倒。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有着相当丰富的内容,其中包括孙中山对知识的来源、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等一系列问题的合理见解,对知行关系作出了与数千年来传统主流观念截然不同的崭新阐释。本文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主要内容、贡献和局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知难行易说的主要内容

(一) 知、行范畴

知与行是知行学说的基本范畴,研究孙中山的知行学说,首先应当从他对知与行的界定入手。孙中山所说的知,从知识的类别来说,主要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指自然科学知识,这是他搞经济建设的科学武器;一是指革命理论,主要是指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等社会政治学说,这是他革命的思想武器。孙中

收稿日期:2008-01-10

作者简介:吴喜梅(1973-),女,宁夏固原人,讲师。

山的知当作知识来说,包括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个部分;就人的认识过程来说,指感性认识也指理性认识。孙中山所说的行,是指能使人类文明发达、国家进步的实际活动,主要是指科学实验、资产阶级革命实践等。在资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它主要又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家即先知先觉者的奋斗。孙中山列举了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四种基本类型的行^[2]。在认识论上,孙中山突破了中国古代哲学将知、行范畴仅仅局限于先验之知和道德修养领域的践履笃行,赋予知、行崭新的内涵,运用了近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从而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实践领域。

(二) 行先知后

孙中山以大量的科学史实、革命斗争的实际活动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反复论证了人的认识过程是行先知后,这是孙中山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也是其知难行易学说的基础。为了论证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通过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个例子,明确主张人的认识过程是行先知后,肯定行在先、知在后,行是知的基础和来源。可以说,行先知后实际上是蕴涵于知难行易说中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它的合理内核。

孙中山的行先知后思想,是同他对事实和言论、客观和主观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认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3]他明确肯定知识、言论是源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客观事实是先有的第一性的东西,而主观认识不过是后起的对于它的反映,客观事物是能够不断地被人们认识的,而且随着人类反复的实践和实际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的知识也就越多,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也就越深刻。在孙中山看来,人的任何知识,不论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还是关于社会的知识,都是来源于行,是事实的反映,在认识事物、解决任何问题时,“一定要凭事实”^[4]，“不是专靠书”^[4]；“一定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4]。

(三) 不知亦能行

孙中山把人类进化史和认识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蒙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4]前两个时期合为一大阶段,统称之为先行后知时期;后一阶段为先知后行时期。

他说:“先行而后知,进化之初级也;先知而后行,进化之盛轨也。”就人类知识的起源和认识发展过程,孙中山认为,人类的知识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开始就在人的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人类经过漫长的不知而行的蒙昧时期,然后才逐渐进入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的文明发展阶段。对于人类进化史的这一总的描述,明确肯定了行在先,知在后,知是从行中产生的。关于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孙中山实际上表述了这样一个公式:行一知一行,即“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4]。

孙中山认为,从“不知而行”向“行而后知”的发展过渡是自然的,这就是“由行致知”的过程,或者叫做“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4]。同时,孙中山不仅强调行是致知的必由之路,还十分重视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反对那种“重实行而轻理想”的错误倾向,鼓励革命党人努力探求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在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下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4]。

(四) 能知必能行

孙中山虽然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行是致知的必由之路,行对于求知、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但他又认为行是容易的,认为能知必能行。

能知必能行,是知难行易说的一个基本命题。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知是很难的;另一方面,知或不知乃是行或不行的关键。虽然不知而行和知而后行都是对于促进人类文明所必不可少的,但二者的效果很不一样:一个事倍功半,一个事半功倍。行的效果不同,关键在于知还是不知,孙中山认为:不知固能行,知之则更有益于行,能更好地促进行。孙中山极力强调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人类进入知而后行的第三时期,一切进步文明都离不开科学知识的指导。此外,孙中山还十分重视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他认为,革命的知识就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要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正确的革命理论作为指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五) 致知方法

孙中山多次说过,人们要取得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必须通过科学的观察和实验;而要取得关于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必须通过革命斗争和其他的社会政治活动来实现。孙中山认为,任何理论和学说的形成都是由两种方法得来的。“一种是用观察,即科学;一种是用判断,即哲学”^[4]。因此,对社

会问题也要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和研究。孙中山还认为,军事理论也是从事实,即战争事实中产生的,他特别强调只有参加革命斗争,才能懂得革命成败的道理和原因。在这里,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行的重要内容,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一样,也是求知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六)知行分任

孙中山把人类的文明进化史划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个时期。和划分人类进化三阶段相联系,孙中山还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的大小,把人分为三大类:“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4]。他认为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来说,这三种人都是不可少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做成的。为什么说这三种人可以而且必须互相为用呢?那是因为他们在与行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同的缘故。在这里,孙中山完全将知与行加以割裂,认为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可以是纯粹的知而不行者,而另一部分人则是纯粹的行而不知者。他把人们在社会劳动中的分工不同看成是知与行的分工,并且把这种分工当作知与行可以互相分离的根据,明确地提出了所谓知行分任论。知行分任被说成是科学发达时代的一大特点,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它的内容就是:“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4]。

二、知难行易说的贡献

(一)具有创新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学说争论的实质是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5]。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是第一个自觉地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将“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相提并论^[5]。孟子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思想,夸大理性认识,否定“学而知之”,排斥行和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荀子则继承了孔子“学而知之”的观点,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后天学习得来的,明确了知行统一,以知指导行,以行实践知,在行的基础上统一于知的思想。宋代的程颐主张知先于行,强调能知必能行,不知不能行。朱熹继承了程颐知先于行的观点,同时又承袭了儒家一贯重视践履的思想。他在知先的基础上建立了重行的理论,并主张知行相须互发,知和行相互依赖,不可分离,二者不可偏废。清代的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统一观,他认为知行相资是循

环往复的发展过程,知行相互渗透,并非象朱熹等人主张的知先行后。同时,他又认为知与行不是平行并列的,“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优越于知,知从属于行,行是知的基础和目的^[5]。

与上述传统的中国知行学说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孙中山承袭了荀子、王夫之等人的行先知后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进化论思想对知、行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孙中山超越前人的地方所在。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民主革命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近代科学知识,大大充实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学说的内容,将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孙中山突破了封建时代哲学家把知行问题主要局限于道德修养问题的狭隘眼界,而赋予它以一般认识论的意义,即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从广义上去探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他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去研究知行问题,并且把自己的知行学说直接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认识论武器,用以鼓舞斗志,指导实践,这在中国知行学说发展史上是不见先例的。孙中山有针对性地提出知难思想,就是要推动其党内同志重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能动作用,从而进一步自觉地实践革命理论。可以说,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典型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认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以前中国知行学说发展的最高形态。

(二)具有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

孙中山对知识的来源、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等一系列问题的合理见解,其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孙中山把知行难易之序倒转过来,把他的知难行易说建立在行先知后说的基础之上,明确地以行先知后论证知难行易,把科学的观察、实验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当作认识论的基础,指出人类的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这就在知的来源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知行关系的辩证法。这种“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辩证思想,在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观点,孙中山能从革命实践中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使自己适应历史发展而不断进步。“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是孙中山提出的一个光辉的认识论命题,是孙中山对知识起源问题的明确回答,这无疑是一个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说明他在知识的来源问题上,不仅认识到

“先有事实后有言论”,主观认识和言论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而且认识到主体是通过行,即通过自身作用于客体的活动去反映客体的,行是联结主体和客体的一座桥梁,没有这座桥梁,客体就不能反映到主体中来,不知就不能转化为知。这样提出问题,应该说是认识论基础上的一大进步。孙中山还认为,任何学理或学问,必须经过“以考其实”的过程,才能知道它是对还是错。在孙中山看来,只有通过行的检验,才能知道知的是否正确。这说明,孙中山已初步认识到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行是认识的目的。孙中山十分重视直接经验,也强调间接经验,承认知对行有反作用,这就使他的知行观具有能动的反映论的某些特点。

三、知难行易说的局限

孙中山的“知行分任”论,在理论上和他自己主张的“行先知后”、“以行而求知”自相矛盾,具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性质,这是知难行易学说的致命弱点。与此相关,孙中山把知难行易绝对化,否认难和易可以互相转化。如果说孙中山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少走了一步,把社会实践仅仅理解为实验,那么在对理论的认识过程中又多走了一步,过分夸大理论的作用,把理性认识绝对化了。实际上,知和行之间并不存在着一般的难易问题,而是存在以行为基础的辩证关系。孙中山只注意到了求知过程中的困难,却忽略了由知回到行、把理论付诸实践同样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因知以进行”也并非一帆风顺,现实生活中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能知必能行”同样有夸大知的作用、贬低行的作用的倾向,似乎凡所知都是正确的,一定能行的,这又否定了通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必要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6]。孙中山知行学说的上述局限性,也应当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他们脱离人民群众,看不到改造中国的伟大的现实物质力量,所以往往夸大主观精神、意识的作用。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也很难完全摆脱这种局限性。孙

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多次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只靠少数革命党人去奋斗。如果从认识论的观点找原因,就是轻视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过分地夸大了少数天才人物的知的作用。他的知行学说过分地夸大了知的困难和重要,过分地鼓吹精神的能动作用,过分地夸张了“思想”、“学说”、“心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把它们看成是决定性的东西,因此不能正确说明知对于行的依赖关系,必然地要走上分裂知与行的错误道路。

四、结 语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哲学思想为他后期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发展准备了思想基础,在当时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和思想进步。知难行易说虽然还谈不上哲学体系上的理论创新,在理论上也有缺陷,但是孙中山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自觉出于革命的需要而比较系统地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今天,人类实践已进入以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全球性交往为特征的新时代,梳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理论,重温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对当今的哲学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哲学工作者应当发扬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的勇气、精神,学习孙中山所提倡的“全凭事实,不尚理想”的科学方法,勤于思考,乐于钻研,树立强烈的时代使命感,突破历史的思维定势,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源泉。

参考文献:

- [1] 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2] 肖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3]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4]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5] 王俊涛.中国哲学中知行观的争论和演变[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16(5):14-16.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Sun Yat-sen's theory that knowing is more difficult than doing

WU Xi-m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 of Sun Yat-sen's theory that knowing is more difficult than doing from the areas, the order, the knowledge and the relation of knowing and doing.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main contribution and limitation of the theor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theory not only has the value of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history and but also has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materialism. At the same time, the theory has metaphysic nature and absolutized tendency for the restriction of that time.

Key words: Chinese philosophical history; Sun Yat-sen; epistemology; view on knowing and doing

(上接第 95 页)

Legal position of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of China's farmers and thei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y

HUANG Jun-f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eg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ibetan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8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have a theoretical establishment for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of China's farm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legal positio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of China's farmers from the legal angle.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se cooperatives are based on the family contractual operation, consisting of the persons operating the same agricultural products, or the provider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same category of production activity, or the product consumers, or the the volunteers. They are the mutu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with 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also the organizations with their legal persons gran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se cooperatives owe their own properties, have rights to use them and divide them, have rights to enjoy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y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obey the laws and other executive regulations in their operation.

Key words: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of farmer; legal position; legal person;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